



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

李治安



杨志玖先生的代表作



今年是杨志玖师诞辰110周年。忆起40多年前在杨师膝下亲炙教泽，入门读史，逐步成长的往事，总不免浮想联翩，感念不已。

我生性愚钝，“文革”后期当过9年工人，

学业长期荒废。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已满29周岁的我才凭着“老高一”的那点儿基础，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说来也有几分偶然因素。大学三年级时，我原本想报考杨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生。不凑巧，1981年，先生中断了隋唐史专业招生，改而开始招收元史专业的硕士。不久我被录取，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元史。

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讲过：认真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入宝山不空归”。单读后人以及当代人的著作，等于开百货商店，纵然货架上琳琅满目，却不是自己的产品，只能做个转手商贩。而我们做学问的，却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遵循先生的指教，我逐字逐句精读了《元史》、拉施德《史集》等基本史书。

记得是硕士第一学期末，我向先生汇报了阅读《元史》的进展情况。先生给我布置新作业：在一般阅读的基础上，做一份《元史·本纪》的大事记。我遵命行事，摘抄汇编了2万字左右的大事记，让先生过目。先生没多说什么，作业算是完成了。当时没有电脑，全凭手抄，花费了十天左右时间，很是辛苦。先生嘱我做《元史》本纪大事记，实乃从精细研读基本史料出发，学会“自办工厂”制造科研产品的早期演练。

针对元史专业对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工具的依赖，先生还格外强调学习蒙古语等语言文字。读硕士之际，先生特意延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包文忠老师（蒙古族），为王晓欣师兄和我开设了两个学期的蒙古语课，让我们接受比较正规的蒙古语训练。又写信向内蒙古大学乌兰老师索要《蒙古语入门》的教材，供我们使用。前一学期，只要先生不出外开会，几乎都和我们同时听课。看到先生年逾花甲依然认真地听课记笔记，我们自然不敢怠慢松懈，鞭策自己加倍努力学习。先生还要求我们到中文系听音韵学的课，我们遵命而行，适时增加了语言音韵方面的训练。

现在回想起来，杨先生克服种种困难，要求和鼓励我们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蒙古语等语言工具，恰恰是为我们研读史料“自办工厂”扫除语言障碍，故而非常及时和必要。

杨先生一生所写短文章居多，长篇大论较少，撰文言简意赅，甚至有些惜墨如金，从不说废话和空话。史学著述尤以重复他人旧说为耻。

我亲自聆听过先生有关考证马可波

罗来华的讲演，也不止一次拜读先生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的成名之作《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从中获益匪浅。诚如蔡美彪先生对我谈及的，杨先生等高明学者并非热衷于发现什么珍本善籍或罕见史料，而是能够立足一般常见史料，慧眼独具地发掘其隐微蕴意而做出好文章、大文章。此文正是运用常见史料做好文章、大文章的典范。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七年的那段百余字的公文，载于《永乐大典》卷19418。治史者稍作翻检，即可找到。然而，百十年来，谁也没能揭示此篇公文里隐藏着马可波罗离华的重要信息。先生之文的高明之处，就是基于多年来对于“回回人”的资料积累，紧紧抓住了“沙不丁”等四个人名和“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等关键字句，然后和《马可波罗游记》、拉施德《史集》等相对比，条分缕析，巧思发微，进而得出马可波罗1291年初自泉州离华的精彩结论。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杨先生指导下开始攻读元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是时，更注意以先生的文章作楷模，广泛占用原始资料，巧思发微，努力捕捉题目并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先生一生的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探马赤军、“回回人”和马可波罗来华三大课题上。其代表作《元史三论》，依实际内容即得名于此。

先生治学的涉及面虽不算太宽，但无一不是元史研究领域的前沿或争论热点，无一不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目前学界风行“十年磨一剑”之说，先生则是一生磨砺三剑，平均二十年磨砺一剑，剑剑都精妙超人，令人叹服。受先生的熏陶，我近40年的元史研究选题，同样采用集团性探讨的方式。

先生精于考证，一生治学以考据见长。他的考据，祖述乾嘉，大部分考据论文把乾嘉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且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显著推进有关研究。部分文章又尝试兼收伯希和等审音勘同方法，往往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以我的亲身感受来说，先生的考据文章中，《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和《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堪称乾嘉方法运用的代表。在这类文章中，先生习惯于先引用一段或几句基本史料，然后旁征博引，逐项排列证据，辨析真伪，层层剥茧，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元代的探马赤军》和《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实乃乾嘉方法与审音

勘同方法融汇一炉的佳作。

先生曾批评史学论文严肃有余、欣赏性不足，主张融学术性、知识性、权威性于一体。即使是撰写微观考据文章，先生亦力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做到语言清新流畅，如同向人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反驳他人观点，先生则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尊重对方，与人为善，从不用武断或尖刻的词句。在这方面的的确文如其人，折射出先生心地厚的品德。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率直诚实，高山仰止，有口皆碑。撰写考据性文章，先生总是坚持真理，有错必纠。在探索考订疑难问题过程中，一旦发现旧作有错误或不足，就毅然公开承认纠正，毫不掩饰。1982年，先生发表《探马赤军问题三探》，接受贾敬颜、黄时鉴论文的中肯意见，依据《史集》有关记载，纠正过去的看法，把五投下探马赤军的解释重新修订为五投下抽调部分军士所组成的混编军。

先生还有个习惯，所撰论文或初稿愿意寄送多位同行朋友，希望及时得到批评或材料信息方面的帮助并听到反馈意见，以丰富和改进自己的课题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与日本学者萩原淳平争论探马赤军问题，是时“文革”已结束，他刚刚把研究重点自隋唐史转向被迫停顿多年的元史领域，外文等资料匮乏，国内蒙元史重要域外史料的整理翻译正在进行中；先生撰写《探马赤军问题再探》《探马赤军问题三探》等文之际，不得不向韩儒林、潘世宪、余大钧等师友求教。在这两篇文章的注释中，先生写道：“本文（萩原淳平《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承内蒙古大学潘世宪先生译出，特表感谢”；“此《史集》俄译本承内蒙古大学余大

钧先生译示，特表感谢”；“此承韩儒林先生译示，特表感谢”等。这种实事求是，志同道合的做法，先生始终坚持。

先生如此行事，充分体现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从善如流的品格。从治学上讲，又可见先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自己的治学开放而非封闭，虚怀而非自傲，能够在与同行朋友的不断交流、争鸣中前进发展。这也是先生晚年老骥伏枥，高水平论著接连问世的原因之一吧！

自1978年负笈南开到如今，已历47载。忆及当年先生学贯中西，笔耕古史，宏著三论，蜚声海内外；津门雅会，研讨马可、中外咸集，盛况空前。吾等问学陋室，考辨求真，教诲谆谆，茅塞顿开；新春佳节，家宴招待，师生同席，恩重情深。

寸草知报春晖，弟子敢忘师恩？拜书短文一篇，以祭吾师冥诞一百一十周年。

（作者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

学人小传

杨志玖（1915—2002），山东长山县（今淄博市周村区）人。著名历史学家。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先在北大文系研究所读研究生，后借调至史语所工作。1941年留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唐史学会顾问、天津市历史学会名誉顾问等。曾任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六、第七、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陋室文存》《元代回族史稿》等专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世代相承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辞海》，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创造精神，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文学以艺术形式或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或探索人性奥秘，归根结底是人学。因此，文学尤其是地域文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表现内容。

文学作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书写往往能为虚构的创作提供仿真的物质外壳。假如一部小说中，写到胡同、豆汁儿、皇城根儿，读者会将故事的发生地定位在北京；如果作品描写了天后宫、鼓楼、海河，描写狗不理包子、耳朵眼儿炸糕，

说中呈现的匠人悠然自得的劳作过程显示出作者热心世俗又超越世俗的审美追求。与之相较，天津的奇人很有意思，他们不但注重技艺层面的革新，更会着意在商品的宣传营销上别出心裁，奇招百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便是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会为其注入截然不同的精气神儿。从不同地域差异化的手艺人形象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天津人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和天津商业氛围浓郁的地域特色十分鲜明。

仔细观察当代文学，就会发现有许多长篇小说中包含非遗元素，比如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等。天津文学中，扈其震的《大画舫》是一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年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围绕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变迁，展现一代代年画创作者以生命去守护年画艺术的心路历程。其间，商业竞争与艺术革新并驾

齐驱，绘画者的经历与年画的命运息息相关，令人唏嘘感叹。小说既表现出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色，又将绘画者对艺术的热爱与虔诚刻画得格外感人。李治邦的长篇小说《津门十八街》则是津味儿十足，作者一方面追溯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八街麻花的历史变迁轨迹，另一方面又为读者勾勒出近代天津各阶层的众生相。此外，李莹的长篇小说《响铜记》，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沽飞镲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发展困境，试图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现代社会进行转型以及传承的命题。

综览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会发现，当作者对非遗过于关注而忽略了人物塑造的时候，文学作品往往会失去灵性与光彩，此时的非遗书写就会变成某种地域文化的堆砌，徒有其形而无其神；而当非遗书写重回文学的本来面目，为人物形象服务，为故事发展服务，展示人类发展的种种困境、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之时，这类书写反而能随着文学作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而流传久远。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学作品中，恰到好处的非遗书写能提升地域文化的审美底蕴，彰显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对非遗来说，文学则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媒介。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跨媒介改编实践，往往能引发人们对非遗的关注热情，使其愈发珍视自身浸润的地域文化，增强其他地域认同感。当前，非遗的保护任重而道远，地域文学的书写也存在着更多新奇有趣的探索空间，也许，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正是一条相得益彰、互利双赢的可行路径。

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四）

天津文学中的非遗书写

王云芳

渲染喧腾热闹的皇会、生动逼真的杨柳青年画，没错，这故事是发生在天津了。读者阅读时在脑海里不自觉地为某个地域画像的过程恰恰说明，“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某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有助于读者“对号入座”，沉浸于文学作品构建的虚构空间，进一步追索文本的言外之意。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外在表象的关联。优秀的作家，往往能透过表象抓住本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点染出该地域独特的文化底蕴。比如冯骥才的《神鞭》，开篇即不惜笔墨地描写天津的皇会，洋洋洒洒、热闹非凡，读来却让人丝毫没有繁琐之感。这段描写不仅为小说主人公的出场构建了必要的物质空间，其本身也成为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审美镜像，暗示了这块土地几百年来依河而生的文化底蕴。近几年来，冯骥才延续了《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的创作，继续为读者讲述津门奇人奇事，其中不少篇涉及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杨柳青年画《鼓一张》、糖堆儿《大关丁》、茶汤《好嘴杨巴》、药糖《四十八样》、花会《跟会》、狗不理包子《狗不理》等。小说中，各式各样的奇人与这些传统手工艺相互成就：传统手工艺品因为奇人的潜心琢磨、精益求精，遂成为地方物产的一绝；奇人形象也因为这些奇技的“加持”而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中国其他地域文学中，也有书写工匠的作品，如汪曾祺原籍江苏高邮，他的小说也偏爱塑造故乡从事传统职业的小匠人，他们专注于技艺本身，小



天津中山公园（水彩画）

叶文并图

天津中山公园坐落于河北区中山路中段东南侧，此地声名远扬，皆因孙中山先生曾于园内发表重要演说。它堪称近代中国首座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并建造的公共园林，秉持“西学东渐，中西合璧”的设计理念，1907年建成时定名为“劝业会场”。我的这幅水彩作品，构图上选取公园入口处那巍峨耸立的牌楼作为主体，中间横匾清晰写就“中山公园”，这四个字仿佛承载着悠悠时光，为整个画面构筑起深厚的岁月积淀。

前些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旅游团去山西平遥古城游览，参观了位于古城西大街繁华地段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该票号创立于1823年，由平遥“西裕成”颜料行财东李大全投资白银30余万两和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日昇昌”的创立，结束了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开创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其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

参观过程中，导游讲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日昇昌”在招人时常会出一些应急考题，一次票号掌柜准备招一批小学徒，面试前让众候考人在家等待，接到传告后方可来票号参加面试，面试合格才能录用。接到传告的候考人都不能直接从正门进入大堂，必须要绕行右侧一个拐弯通道，从后院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大堂。进入大堂的人见到手持水烟袋、安坐在太师椅上的票号掌柜，这才算正式进入面试。

那天接到传告的多个候考人中，只有一人面试合格被录用，日后他成为票号的新学徒。这名候考人接到传告后，急速来到票号，通过右侧的拐弯通道时，忽然看见几块银元丢在路旁，他捡起钱后快步进入大堂。见掌柜并非手持水烟袋

“日昇昌”考题的启示

范志强

开，如果对钱过于敏感，心生贪念，揣进自己腰包，不讲诚信，那这个人绝对不能在票号当学徒；最后是干活儿要讲究效率，通过对候考人从接到传告，到进入大堂见到掌柜所用时间的长短，来考查其时间观念，从而判断其工作效率如何。如果一个人没有时间观念，就一定不会有高的工作效率。

“日昇昌”票号的选人故事虽然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中蕴含的不仅是晋商精神和商业智慧，还能给当代社会提供选人用人的某些启发。这个故事提醒人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行各业选拔出具备讲诚信、讲道德、讲规矩、讲效率等品质的员工，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些无法被量化的品行维度——道德直觉、情境感知、价值判断，也是组织性的真实来源。

“日昇昌”票号的选人故事虽然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中蕴含的不仅是晋商精神和商业智慧，还能给当代社会提供选人用人的某些启发。这个故事提醒人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行各业选拔出具备讲诚信、讲道德、讲规矩、讲效率等品质的员工，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些无法被量化的品行维度——道德直觉、情境感知、价值判断，也是组织性的真实来源。

“日昇昌”票号的选人故事虽然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中蕴含的不仅是晋商精神和商业智慧，还能给当代社会提供选人用人的某些启发。这个故事提醒人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行各业选拔出具备讲诚信、讲道德、讲规矩、讲效率等品质的员工，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些无法被量化的品行维度——道德直觉、情境感知、价值判断，也是组织性的真实来源。

每年放长假，全国著名旅游景点总是人山人海，景点客流的疏通引导、采取的安全措施等，已成为广受关注的假日常态话题。有一年，几个年轻的朋友在“五一”假期游泰山，没想在通往南天门的长山道上拥挤成一堆，动也不能动，上下不得行。朋友笑着给我发来视频，以高举手机的姿势，展现无数游客挤成一条“卧龙”的无奈。朋友回京后邀我相聚，我便给他们讲我年轻时登泰山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去济南开会，会议结束后独游曲阜、泰山。那些年，旅游业方兴未艾，打着三角导游旗的团体游客很少。我离开济南，只记一个大方向，自己购票坐火车，先到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看了，又乘车到泰安，当晚找了一家旅社住下，准备次日登泰山。

正是冬天，小城泰安真安静，街上行人很少。早晨，我将行李存放在旅社，打算当晚住在泰山山顶上，不慌不忙看次日出。如今想来好笑：泰山山顶上有没有住的地方？住宿费多少钱？我想也不去想。我只在行李寄存处换上运动鞋，按旅社的指示，坐3路公交车到红门，微笑着迈开登泰山的第一步。泰山道有如山阴道，真让人目不暇接；沿山路的刻石，是文化长廊，总是吸引我驻足。反正，我是打算当晚住在山顶的，行路也不着急，看见书法和内容好的刻石，就取出随身带的笔记本临摹，走走停停，一“撞人”泰山这一人文地理巨著中。

走到经石峪，雄浑古穆的榜书《金刚经》扑面而来，让我大吃一惊。那几百刻在石坪上的般若经文，以大雄之力，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扉。我双手合十，心中默念：假如在夏秋季节，清冽的山泉“覆盖”在经文上，一道闪亮的瀑布挂在眼前，我就进入清凉世界了。泰山道上，这一片与山同体的浑圆汉字，是我听到的无声梵呗。中国的书法艺术，如果是在名山大川的悬崖峭壁上展示，名山为之增色，自然蕴含人文，刀刻笔削的线条就具备永恒的艺术生命。

泰山刻石，不少是隽永、简略的对眼前风景的文学性赞美，也有游客抒情言志的内容。有一处汉隶字体石刻，是书写者自励并鼓励其他游客的句子：“愿同胞努力前进，上达极峰，独立南天门，高瞻远瞩，捧日拿云，可以张志气，拓胸襟，油然生爱群救世之心，感斯山之永固兮。国家柱石，曰严曰峻，威然吾民族之威积。”书写者在登山途中生发爱国主义情怀，将自己的即兴感怀深深地镌刻在山壁上，时间是1929年。

走到云步桥、观瀑亭，我抄下“洗心”“涤虑”“月色泉声”的刻字，仿佛身在画中，欣赏这一处绝佳风景。虽是冬天，我已走得浑身冒汗，就转身在一个角落脱掉毛衣毛裤。卸下两件衣服再起步，顿觉身轻如燕。

午后，我到了中天门，在小卖部要一杯茶，慢慢饮，暂时休息。透过高倍望远镜，遥望顶天立地的南天门。此刻，我的思想开始斗争：“累哇！要是不想再步行登山呢，有缆车；要是中途而返呢，有下山的汽车。关键路段正在考验登山者的意志，但我真累了啊……不行！要继续走。”到四棵松下，我再补充能量，向小卖部要一壶水，再泡一杯浓茶，为自己续航加油。有一个只挑六棵白菜的挑夫也在此处休息。我近前询问，了解到六棵白菜总价一块八角钱，脚费五元。肤色黝黑的泰山挑夫，每天跑两次，收入十元钱。

虽然那年我还年轻，但到了朝阳洞，又渴又饿，腿软目迷，气喘如牛。碰巧，山旁路旁又有一小店，我买